

# 回望图经

## ——新方志变革的思考

张 灵

**提 要：**由于诸多原因，新方志已经不能够像古代方志那样稳居地方权威性文献的地位。为破解这一困局，尝试从早期图经中获取思路和资源，以此改变新方志的设计思路、篇目结构和编纂体例，从而让新方志重新焕发活力，以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具个性的表达来获取新时代受众的认同。

**关键词：**图经 变革 思考

图经作为方志的重要源头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图经之名，起于汉代，诸郡要皆有图经。”其最初形式接近地图旁的注文和释义，“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sup>①</sup>，所述建置、疆域、户口等方式已可看出后世方志体例的滥觞。至北周、隋，图经和方志开始合而为一，隋大业《区域图志》每卷卷首即为地图。通过对唐《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的释读，可以看出其分门别类、有图有说、综合记录的方式已接近于较完备的方志体例。宋以后，图经近乎被方志全盘吸纳，更偏重于文字记载，地图的作用日益缩小，“图经”之名逐渐消亡，代之以“志”，如《严州图经》在宋绍兴年间的刻本就改名为《新定志》。<sup>②</sup>

在两轮新方志编修过程中，经过多次理论研讨和长期编纂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统一的方志体例。其中有“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横排竖写，有详今略古的时间断限，有志表结合的科学归类，还有在实践中被当作操作指南的述而不论、排斥纪事本末体、改写总结体、人物生不立传等具体要求。在新体例的助推下，新中国的修志事业完成了方志史上覆盖最全的两轮方志编修。但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也早已出现了全局性记述编纂乏力、社会新变化体现不足、篇幅过于庞大导致无人问津、行政体系之外的资料肤浅粗疏等问题，尤其在第二轮修志中，为追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方志编修一方面要固守业已形成的体例范式，一方面试图在“反映特色”的名目下做局部修正，但却有两者皆失的遗憾。数年后即将启动的第三轮修志，面对的是更为飞速改变的经济社会，是继续沿着体例惯性往下走，还是在设计上作出变革性调整，重新赢回方志作为地方权威性文献的地位，这将决定身处资讯时代，方志是成为能够被受众广泛接纳的有效信息，还是摆在书柜中装点背景墙的书脊。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面对困境、难以破局之时，从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寻找借鉴和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图经正代表着早期方志的未圆满形态，其较为粗糙的形式中恰蕴含着勃勃的生机和无限的变化。回望图经，可以对一些已经固化为思想信条的方志理论和基本体例诠释进行再思考，比如方志被称为“地方全史”，而全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方志是否是一个可以普遍适用、涵容百业的文体？新方志体例中的诸多禁忌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还是拘于当时

① 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页。

② 参见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第64页。

情况的画地为牢？伟大的文艺复兴并不是将欧洲带回希腊时代，而是从中寻找可供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资源。回望图经也并非重修图经，而是在其中探索让方志事业焕发活力的可能性。

## 一 新方志特点的再思考

新方志是在旧方志传承和新时代需求的共同基础上产生的，其诞生之初有着鲜明的特点和灵活性，为新中国当时的方志事业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编纂过程中不断自我固化和覆盖面增大而丧失了个性特点，使之在第二轮修志中就已有庞大、臃肿、僵化的实践反馈，不到20年时限的续志往往达到首轮通志的七成篇幅，而且用了如此海量文字，在最试图彰显的“改革开放”记述中，不仅没被社会公认为“权威”，甚至是被置于难以传播的边缘地位。逝者不可追，面对已完成的两轮志书，不妨思考一下某些被奉为圭臬的理论解读和体例诠释，是否在新的时代和形势中，还能够作为整个编纂体系的基石。

（一）“一方之全史”是否等同于“百科全书”。清代章学诚将方志称为“一方之全史”，在新方志的编纂理论中，则直接阐明“应该继承旧方志的这一优良传统，把新方志编纂成地方的百科全书”<sup>①</sup>。然而“全史”真的就是百科全书么？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史历史，全国性通史即可谓全史，纪传体伟业“二十四史”，编年体巨擘《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先驱《通鉴纪事本末》，其记载之内容与“百科全书”的要求相去甚远，不仅市井营生绝少书写，而且地形物产记述亦极为疏阔，“一国之全史”尚不能等同于“百科全书”，那么“一方之全史”又如何能够自诩“百科全书”？

近代“百科全书”始于18世纪的欧洲，西学东渐后舶来我国，被定义为记述人类一切知识门类或某一知识门类的工具书，是有着自身传承和规则的一种类书，其核心要求就是“知识总汇”。仅此一点，方志穷尽手段，亦难企及，反而会照猫画虎的过程中丧失自身原先的个性和优势，并带来原先不曾有的问题和困境。旧方志的志记、掌故、文征三个最重要部分，在新方志中要么权重较小，要么被消融在浩渺的“百科全书”中。一味追求“知识总汇”，使方志最鲜明的特点被抹去光芒，这种自废专长的行为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而显得尤为不明智，失去个性的声音在信息洪流中是没有坐标的。

被很多使用者和社会公众广泛抵触的巨大篇幅，根源上也来自新方志“百科全书”化的结果。明清方志鼎盛时期，很多府志原文照录了大量“艺文”，然全书篇幅也仅在百万字的级别；而新时期同地域的市志中，录文不到明清府志的十分之一，全书篇幅却都在千万字左右。这种数量级的提升就源于百科全书的倾向，后果是一方面大量与旧方志体例方枘圆凿的资料涌进方志，以体量重新塑造出部分新方志体例；另一方面则是有效资讯被海量文字所淹没，使读者难以在新方志中快速获取资料，加速了其被束之高阁的进程。

辨意析理，如悬灯于路。回到出发点来思考最本初的动力，将增强我们再出发时步伐的坚定。必须明确的是“史”和“百科全书”是各有传承规范和脉络理路的不同文种，“全史”绝不是“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更不能按照百科全书的思路来编纂，否则将失去蕴含在方志中绵延千年的独有文脉，从而使其成为以舶来品为主干嫁接而成“西体中用”的四不像。只有回到原点，破去迷思，将方志回归历史与地理之间的平衡来思考，才能够挣脱许多无论局部如何修正也无法摆脱的困扰，完成一次新方志体例上的回归和前进。

（二）“官书”定位不限于“写官事”。强调方志作为权威地情文献的常用表达中，就有

<sup>①</sup> 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第176页。

“官书”一词，而其中演绎出的一些规定和要求，依然是今天方志机构的基本框架，如修志机构的官方化，修志经费的财政负责，县级以上志书的依法修订等。但在记事方式上，官书是否就是“写官事”则有着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目前的两轮修志，都是在行政主导下进行资料收集、分篇编写、全书总纂的，有着非常鲜明的“写官事”特征。

在两轮志书的编纂中，党政部门内容均是记载最为详细的，不仅整体工作脉络清晰可见，而且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也能记载周全。这一方面源自行政主导下获取“官方”资料较为简易，另一方面也显示新方志中“写官事”依然是首要权重。最能说明这种倾向的是两轮修志中经济部类记载的不同，在首轮修志时限内，大部分经济部门依然在党政部门统合的“盘子”里，属于“官事”的一部分，所以记载的丰赡程度接近于党政部门。而到第二轮修志，行政职能发生了改变，退出一些经济管理领域，于是这一部分脱离“官事”的篇章立刻出现了资料不齐、脉络不清、碎片化拼凑严重等问题，与记载党政部门的篇章形成较大反差，这恰恰说明“写官事”仍是新方志中较偏重的部分。

自民国始，方志学理论已觉察到要从以写官事为主转为写民事为主。“吾国史志，大率详于政府而略于闾阎。”<sup>①</sup> 在新方志中也从意识形态出发，强调了内容大众化，但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因为经济社会管理加强等原因，官事的篇幅相对于旧方志反而提高了。这说明方志体例因其部分源于史籍，且由于资料收集、编纂人员等原因，有着趋于写官事的内在动力，为了平衡这种趋势，需要从图经这种地理记述的体例中寻找更多的智力资源和可操作的选择，将写民事这种理念真正落实到具体编纂中。

（三）方志文体并非广泛适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没有任何一种文体能够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同一事物，面对不同受众必然会采用不同文体，一份优秀的考古学报告和一本光怪陆离的盗墓小说显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关注人群。方志作为一种有着独特个性的文体，也有着自身的适用范围，但在新方志中，它却被应用远至山川疆域，近至民生日常的所有方面，于是记载对象的不同，也产生了落差明显的记述效果。

在新方志的地理、党政、人物等门类的记载中，方志文体依然显示出优势，条理清晰、脉络鲜明、项目完整，较之旧日史志亦不失权威。然而在科学技术、产业经济、基建交通等篇章，方志就显出越俎代庖后的不适应和尴尬。在民国的近代实业记载中，方志纂修者就已发觉其在技术环节记录中的劣势，主动规避了此类内容，如《大田县志》中“大田锅厂”的条目下仅叙述工厂位置和产品售卖，并不涉及具体技术环节。<sup>②</sup> 到了新方志中，技术工艺更趋复杂，方志却试图代替工艺手册，其效果则事倍功半。《福州市志》的“差压流量仪表”<sup>③</sup> 一节，试图将整套工艺流程和使用特点完全介绍，于是整个篇章全是专用名词和技术指标，令普通人望而却步。其实对于业内技术人员而言，这些资料对重现生产环节毫无价值，从而整节就成为上不及专业、下难以普及的尴尬文字。到了《福州市志（1995—2005）》中，不仅全盘保留了对差压流量仪表工艺细节的写法，还将研发步骤也加入，彻底成为低配版技术手册。<sup>④</sup>

① 李正谊修，邹鹤纂：民国《吉安县志·例言》，“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4页。

② 参见陈朝著：民国《大田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点校本，第302页。

③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3册，第85页。

④ 参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1995—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第5册，第78—85页。

从以上例子中能看出，方志是有优势、有短板的一种文体，强于山川地域、典章制度、职官人物、艺文民俗等记述，而短于技术指标、数据分析、施工流程、金融动态等方面。以交通而言，“十洋新街，在县前直下百步许，街如十字，因名”<sup>①</sup>为其所长，“引进日本IDD履带式打桩机，锤重4.5吨，桩断面40×40厘米，每节桩最长15米”<sup>②</sup>则为其之短。文体应用需尽量扬长避短才是最基本的思路，规避自身的不足，将资源集中到强项上，形成有特点的拳头品牌，方能在权威性上作出文章。

（四）记事体例是方法而非教条。新方志因规模过于庞大，组织编写的架构亦高度依附于行政体系，所以在体例中设置了诸多规则，方便以流水线的方式批量快速修改文稿，提升志书的编纂速度和质量。然而落实到具体的事例中，很多编纂是不能画地为牢的，说明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都是曾经应用于古代的史书和方志中，其并非不能与新方志兼容，所以要重新思考各种被摒弃于方志体例之外的“不可用”中，是否有些是新方志早期编纂的画地为牢，而非自古相传的法则和自然而成的规矩。

以纪事本末体而言，自诞生起就因其“揭事为题，类聚而条分”的特点而成为史书编写的重要方法。在明正德《武功县志》《朝邑县志》，明崇祯《河曲县志》中都广泛运用了纪事本末体，遂可知此笔法与方志并无拮抗之处。明正德《福州府志》的《杂事志》中更是广泛运用该体例，收纳了大量故事。以将来信息需要吸引公众，让读者产生黏性的要求来看，纪事本末体将会是方志形成突破的重要办法。

再论说明体，旧方志的山川、地理、寺观、物产等门类即大量运用说明体。在描述自然现象和部分变化较少的静态社会景象时，说明体有着简洁、准确、客观的优势，将其适当地加以使用，对压缩新方志的篇幅有着很大的助力。从中可见，方志的体例笔法应该是有层次的、变化的，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并不是所有篇章都拿来横排竖写才能称为方志。需要摆脱掉原先作为权宜而逐步教条化的一些限制，方能让志书体例在面对丰富多彩的经济社会生活时保持足够的灵活度和兼容性，产生更有社会影响力和辨识度的方志成果。

## 二 图经对编修新方志的启示

这里所说的图经并不局限于冠名以“图经”者，而代表着方志中“地理书”一脉的源流，从《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地记”到《巴郡图经》《广陵郡图经》到唐代《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到明代《九边图志》。虽然经历了与方志的融合，但其记载地理的脉络从未断绝。至清代戴震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国朝之言地理者……而先生乃至其上”，形成了着重考证地理沿革和方位的“地理学派”。尽管在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学”建立后，地理学派逐步式微，但在今天重新审视新方志理论的时候，站在图经一系的地理学派角度，将会看到新的视野和方向，发现许多未曾预测的可能性，获得开拓新路的启发。

（一）方志与地图的关系。图经是一种以地图为主，文字配合加以诠释的体裁，随着与方志的融合，地图的比例越来越少，明清之际尚有十余幅地图的方志。而新方志中“标配”就是一幅境域图和一幅城区图，部分方志间以一些地域特点示意图，如降水线、农业分布、旅游景点等，其比例相对于新方志的篇幅，可谓沧海一粟。方志试图继续锚定地方权威文献的地位，将优势项目保持并发扬，就需要回溯图经中地图居于支配地位的体例，从中借鉴方法，

① 李驹主纂：民国《长乐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点校本，第135页。

②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册，第243页。

进而打开思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今地图早已不是昔日只有示意方位作用的粗略图记。纤毫毕现的细节、可以追溯的变动，本该为方志编写提供强大助力，然而局限于僵化的体例要求，地图的作用不仅没有随着技术进步而日益强大，反却日渐消退，成为新方志装点门面的一幅饰品。这对于延续千年的地记文脉，是一个苍凉萧瑟的背影，而对于方志而言，这是失去的机会，也是未曾磨砺的剑锋。笔者认为，是时候从图经中审视地图在方志中的千年流变，思考其中的落差和后果，重新确定方志和地图的合理关系，从而打破现在方志体例的固化，为新方志的编写探出一条新路。

(二) 从图经中再审视方志篇目框架。唐纂修图经的制度为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有山河改移，则要随时报送，可视为州府的主要工作之一，相对于现在20年左右一修的方志，其频度是相当高的。参考现存的《沙州图经》篇目，可知这种需要高频率更新的图经在篇目上集中于天文、山川、水利、道路、城垣、公共建筑、民俗等几类，这对于今天确定新方志的篇目、框架、体例都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启发。

图经篇目框架较“轻”，其特点是编纂格式化程度高，编修过程便捷准确，其成品的辨识度高、特点非常鲜明，这些无不暗合现今信息争夺受众中意图脱颖而出所需具备的特色，不能以高速可重复方式快速生产的资讯很容易在信息洪流中被吞没，而个性不足的成果难以在字节海洋中争取到浪花翻起。因此，尽管图经只是方志早期粗粝尚存的来源之一，但是其篇目框架所揭示的“快”“轻”“特”等路径选择，施之于当今仍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将这些思考融入新方志的编纂中，能够为提升方志在信息平台上的竞争力起到脱胎换骨的作用。

(三) 图经的记述方式。图经最早就是地图旁的解释说明性文字，至隋唐，形式上仍是一图一说，图说相间。这种极简、近客观、不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在描摹相对静态的事物上有着先天的优势。而且，说明性文字没有硬性框架限制，在其中夹杂进一段纪事本末体的故事或传说，或加入一段人物传略，都不会被指向体例上的冲突。可以说图经的文字记述是在最简易中蕴含着最丰富变化，在极平实中潜藏着囊括万象的深度。

图经的记述方式在旧方志中得到较好的延续。“侯官县：州西南百步。唐武德六年置，治州西江岸水陆三十一里。”<sup>①</sup>“溪山书院，宋淳化二年建，朱文公书匾溪山第一，今废。”<sup>②</sup>至民国修志亦有赅续，“小西湖，在九都。顺治间，买民田一十六亩开成”<sup>③</sup>。在加入故事和传略上亦为简便，“美宅里：祭酒岭。湛温，光州人，事王延翰，官至御史大夫，国子祭酒……延翰命温往钱，因鸩之。温叹曰：唇亡则齿寒，吾宁以一身代万人肝脑涂地。引卮独酌，毙于岭下”<sup>④</sup>。可见这样的记述方式常见于古代方志文献中，将其纳入新方志的记述笔法，一方面能够让新方志在形式上远接古意，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能拓展其包容空间，从而创设出有特点的记述体例。

### 三 借鉴图经探讨新方志体例变革

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中20年左右一修方志的要求，很多地方即将进入第三轮修志周期，其中的资料收集、文献储备等工作需要先行开展。在此期间，有必要对第二轮修志开展较为全方位的检讨。其中的一些问题和瓶颈已经极大影响了方志作为权威性文献的地位，如全局资料

① 梁克家：《三山志》，海风出版社，2000年点校本，第12页。

② 喻政主修：万历《福州府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点校本，第128页。

③ 李驹主纂：民国《长乐县志》，第77页。

④ 梁克家：《三山志》，第13页。

缺乏、对社会变化反应迟钝、民间资料难以整合、找不到适合的方式正常反映时代特色、篇目体系过于庞大、编纂效率较为低下、方志成果为社会接纳程度不高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得到较好地解决和调整，因循而下的第三轮志书将愈发失去特色和受众，成为自出版起就只能坐镇仓底的摆设。通过分析作为方志源流之一的图经特点，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智慧和资源，重新整理新方志的结构和体例，进而为新方志的变革寻找可靠的助力和途径。

（一）设计思路之变。从图经到方志的发展历史，本质上是地理书向史书变化的过程，“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史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仍重视地理书和史书之间的平衡，“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sup>①</sup>，也就形成了明清鼎盛时期方志中地理和记史的均衡。但随着新方志引进“百科全书”的编纂思路，不仅大大冲击了方志中史书的特点，也导致地理书的源流几乎完全被湮灭，两轮新方志中的地理记载不仅在篇幅上缩减至方志史上最小的权重，在细节上也难以与旧方志相提并论，从而导致方志最权威的一个基石被撼动。

所以在新方志的设计思路上，一定要摒弃“百科全书”思路，明确方志绝不是一本就能囊括该地域方方面面、点滴巨细的全书，而是一个有专长、有特色，也有短板、有规避的类书，恢复旧方志中地理书和史书之间的平衡，复原方志所应有的特色。在抛开百科全书的束缚后，才能突破篇目、体例、记述上的各种条条框框，将庞大且僵化的结构转化为灵活轻捷的新应用，既能承接古老相传的方志体例，又能在信息时代展示方志的特点和个性。将百科全书的设计抽离，对解决新方志篇幅过大、进度缓慢、资料参差等老大难问题能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从而大大加强方志对社会需求反应的灵敏度，真正在社会上建立起权威知晓度。

从全书到类书的思路更替中，对成品的形式亦要有所设计，百科全书往往是以一本巨著或者一套大部头形式出现，这深刻影响了新方志的目标设定，令其巨大的篇幅几可媲美百科全书。而如作为类书，编纂过程没有必要所有项目同步进行，比如《福州市志》可以完全收缩到境域山川、党政机关、著述文献、文物风俗等几个源自旧方志的项目，而具体经济门类、各项社会事业、机构内部资料都可以用如专志、资料汇编、简史等其他形式来实现。变换了设计思路后，方志不再是一套动辄数百万字乃至千万字的鸿篇巨著，而是以近似旧方志结构体例的《市志》《县志》为龙头的系列丛书。对单本书而言，编纂的需时和难度都大大降低，对整个方志事业而言，能够根据地域特色灵活安排丛书编纂的进度，做到全过程、有选择的编纂。这也是方志从“一本书”向“一项事业”发展的可行途径。

（二）篇目结构之变。设计思路的变化首先就会落实到篇目结构上，新方志巨大的体量最先体现在篇目上，《福州市志》有78篇，《福州市志（1995—2005）》有60篇，而明万历《福州府志》只有10类。更大的篇目意味着更多的资料收集、更复杂的编纂安排、更大的资源投入，同时也意味着很多浮于表面、无法深入、不适合方志体例的记述将分散方志拳头产品所应得到的资源和受到的关注，其结果是方志的星光被成片的人造光源所吞没。以成指数级的巨量努力去收获更没有特点、更不被认同的成果，在公共管理领域视之为浪费，在文化遗产的角度则为割裂。所以需要在篇目方面对照图经、旧方志作出使其更为“传统化”的转变，才能够将方志文脉从史册中接驳至未来。

<sup>①</sup> 杨升云：《瑞阳志序》，熊相纂：正德《瑞州府志》旧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990年影印本，第42册，第974页。

对于方志而言,所必须保留的篇目是大事记、疆域地理、党政机关、文教体卫、人物传,再加上一两个当地特色的工农业,即可制定为篇目,按此计算,疆域地理应有政区、山川、人口、交通、邮电、市政、城建等项目,党政机关应有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强力机关、武装力量、外事等,文教体卫则有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加上文献汇编等附录,市级方志应控制在30篇内,县级方志则在20篇左右,如此的篇目设置才能从根本上将篇幅压缩下去,将方志特色凸显出来。

篇目的变革不仅是规模上的做减法,更是对自身传统和价值的回归,方志最重者乃是地理和人文,《明一统志》27目中24目为此二类,可见在漫长历史中通过不断选择和适用竞争而形成的方志书写有着自身偏重和判断。任何一种书写方式,其结构、其体例、其规范,本身就蕴含着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此,意图体会并传承方志的内在逻辑和权威性,就需要在今日经济社会现实基础上对旧有体例作一定程度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复古,而是找到决定方志之为方志的立足点,从这里出发,才能做到延续,也才能做好开拓。

(三) 地图记述方式之变。意图恢复方志记述地理书和史书之间的平衡,需要极大提升地理记述的篇幅和层次,而改进地图记述是最为快捷有效的方式。近代以来,随着测绘和制图技术的进步,绘制地图在精度和范围上已经令旧地图难以望其项背。通过地图的使用,以图经的方式,可以表达出前所未有的信息量,从而使方志的地理记述以现代方式实现古老的图经式表达。

方志中现有的少量地图对于地理记述而言是非常缺位的。欲实现地图记述,可以尝试3条途径并行而前。第一种是在较为静态的自然地理中,可以在总图后细分为系列大比例尺的区域图,共同组成自然地理的阐述。第二种是在较有变化的建成区图中,应综合建筑、交通、市政等要素,按照唐修图经“三年一造”和重大变动随时呈报的要求,以街道、乡镇或社区为基本单位,每3年列大比例尺地图一张,辅以图说,从中能够自然表现出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以福州市而论,6区共计街道64个,按详今略古的办法以近20年为主,建成区的记载就将是400余张地图为主的图经式讲述;第三种则是相对统合概观式的示意图,可适用于人口、作物、产业等方面,也以3年为一期来反映人口变迁、产业聚集和作物更替等,比例尺可较小。以这3种形式组成的地图集能够讲述方志拳头产品中将近一半的内容,从而让图经之意跨越千年、以新技术方式重现于新方志中。

地图讲述亦是最能够以正常时序表达来反映地方特色、时代特色的。3年一更的建成区图中,肉眼可见城市在何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交通设施对外发展的频次,大型公建完成的节点,都能够直观体现在地图中。而产业示意图中,则可以看出产业发展的脉络、各项产业间的兴替、产业带来的城市效应。于是,图经不仅是代表方志源流的历史传统,更是能够在信息时代展现方志特点的有效载体,用新技术、新表达来做好图经,新方志最靓丽的一抹色彩就已经呈现出来。

(四) 笔法体例之变。从图经、旧方志的特点分析中,已知说明体、纪事本末体不仅不应该是新方志编纂的禁忌,反而应是图经式记述中的特色和奇彩,说明体是图经释文的主干,纪事本末体的故事是方志中的亮点。将原先壁垒森严的横排竖写体例转为融合了各门类下自然适用的体例,既扩充了方志的表达空间,也让方志因尊重各门类内在记述规律而编纂效率大为提高。

方志是否完全“述而不论”,在旧方志中推敲则未必。明万历《福州府志》中几乎每卷都有“论曰”,“岂其政然耶,抑地使之然耶”<sup>①</sup>,“其递君递长,夫亦治乱废兴之林也”<sup>②</sup>,《永福县

① 喻政主修:万历《福州府志》,第316页。

② 喻政主修:万历《福州府志》,第361页。

志》《长乐县志》《平潭县志》也有此体例，可见旧方志中本不禁议论。而且在新方志的实践中，全书概述、分篇综述等都明显带有论述的成分，可见按照“事有可议者，僭于条末，小为按，大为论”<sup>①</sup>的不喧宾夺主式议论似不宜做一刀切处理。

借鉴年鉴的做法，将党政机关的记述进行条目化处理。现今修志机构几乎全都兼具编写年鉴的职能，对其文体掌握最熟、理解最深，完全可以将年鉴的一些优点应用到方志编纂中。在党政机关的项目下，主干是横排竖写的机构沿革和主要工作，而到了具体事项中，完全可以采用年鉴的条目形式，增强方志的表现力和可读性。坚持而不固守，学习而不照搬，这也是从地记到图经到方志这条千年笔墨叙地之路上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 结 语

图经作为上承地记的地理著作，是方志文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图为地图，经为说明文字，“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训”<sup>②</sup>，其代表的地理记述在旧方志中一直和历史记述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是方志中极具使用价值的一部分，也是方志作为地方权威文献的核心基石之一。在新方志编纂中，由于受到行政主导下“百科全书”观念的影响，地理记述被过分弱化，使其从方志中篇幅最大的类别之一萎缩成权重极小的一隅，导致方志里最具历史传承和独特个性的亮点淹没在文字汪洋中，其权威性亦在新时代中受到怀疑，相当程度上被束之高阁。

为破解这一困局，传承方志的地理记述，我们试着从古老的图经中寻找资源和借鉴，将汉唐以来的编纂思路和采写方式，与新技术下高精度的地图绘制、现代社会对地理信息的需求相结合，在观念和实际操作上对新方志编纂方式作出一定修正，让古老的图经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长期方志实践中地理信息的构建重新展现在新时期的方志编纂上，从而使今日的方志既能承接源远流长的方志文脉，又能在新时代信息竞争中表现出强烈个性，在众多来源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得到使用者和研究者的肯定，从而再次收获“志属信史”的广泛认同。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唐胄纂：正德《琼台志·凡例》，海南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7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引李宗谔《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页。